



LUN WEN JI

“民国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 编

乌鲁木齐 2013.9

“民国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

论 文 集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 编

乌鲁木齐·2013.9

目 录

辛亥 100 年祭·····	汤永才(1)
中共党人影响下的新疆各族民众抗日救亡运动·····	陈国裕(16)
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与统合方略的纠葛 ——1944~1947 年国民政府统合新疆政策研究·····	冯建勇(24)
乌依古尔等人谈三区革命·····	纪大椿(55)
民国时期新疆历史上的疑案和谜团·····	吴福环(63)
从历史角度探索新疆之乱的前因后果·····	汤永才(65)
伊犁武备速成学堂·····	张文亚(74)
论杨增新主政新疆之功过·····	张志和(79)
论沙里福汗的历史贡献(提要)·····	贾合甫·米尔扎汗(87)
论邓缵先的“细微”之道·····	刘学杰(88)
马仲英赴苏及其下落·····	王希隆(95)
民国时期新疆不可回避的人物马仲英及其研究 ·····	阿丽娅·托拉哈孜(105)
吴忠信是怎样就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的·····	陈 超(114)
蒋经国二访迪化史证·····	崔保新(120)
1924 年布尔根河事件述评·····	刘国俊(139)
喀什哥老会时的英俄帝国·····	刘学杰(148)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出笼前后英国对中国新疆政策述论	
.....	许建英 (156)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红军两次出兵新疆及其原因	
.....	杨 恕 曹 伟 (168)
盛苏结盟对新疆与中央关系的影响.....	欧阳云梓 (177)
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	纪大椿 (198)
从务虚转向务实的“收复主权方略”	
——国民政府对新疆外交权之统合研究.....	冯建勇 (214)
冷战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周恩来的努力及其结果	
.....	沈志华 (225)
近代边疆问题中的“国际因素”：以民国时期的新疆为中心的考察	
——兼评《民国时期的英国与中国新疆》.....	段金生 (243)
民国时期新疆币制改革刍议.....	黄志刚 (258)
民国时期山西票号在新疆的衰落.....	张长江 (262)
民国时期新疆电信业述论.....	沈建刚 (268)
民国时期新疆部分有名维吾尔族商家.....	阿不来提·努尔东 (277)
近代新疆汉族商帮的内部社会结构探析.....	贾秀慧 (283)
试析晚清民国时期新疆乌兹别克洋行	
.....	拜合提亚尔·吐尔逊 张万财 (291)
论民国新疆实业厅长阎毓善对新疆矿业发展的贡献	
——以石油、煤矿、铁矿、金矿为例.....	杨博惠 (310)
民国新疆：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并悖.....	周 弘 (323)
国民党政府“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在新疆的实践	
.....	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 (345)

民国时期阿勒泰哈萨克族牧民暴动初探…… 阿布都力江·赛依提 (357)

论民国新疆察哈尔蒙古的民族关系 ……………吐 娜 (365)

民国时期新疆西方基督都传教士“间谍案”历史考(提要)
…………… 木拉提·黑尼亚提 (383)

清末至民国前期新疆昌吉县域的庙宇与民间信仰 ……………王鹏辉 (384)

描述“民国时期的新疆”维吾尔文史资料简况
…………… 海热提江·乌斯曼 (392)

绝域绝业之困境——民国新疆地方志修纂事业式微剖析
…………… 赖洪波 (402)

民国新疆维吾尔族服饰研究…………… 段丽娟 (411)

辛亥 100 年 祭

汤永才（新疆自治区政协原文史办主任）

2011 年，辛亥革命 100 年；而 19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 90 周年。辛亥革命和建党相距是 10 年。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废封建帝制恢复中华，建立共和。但孙中山先生所建立的国民党，并未真正的完成这次资产阶级革命，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反帝反封建和给农民分土地的资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所阐述的亚细亚社会的东方，中国这 100 年的革命的历史历程，它的经验和教训，对东方的社会是有启示作用的。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但各个国家的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尽相同，又有各自的特殊性、长期性和反复性。

中国是个文明的大国，在世界历史长河中作出过它应有的贡献。又由于这个东方封建专制的农业大国，到近代发展缓慢，由盛而衰。在 19 世纪中期，被西方列强的侵略，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最早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清政府的丧权辱国，处处挨打的局面被激醒，他们在探索和寻找富国强兵的道路。从 19 世纪末起，发生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合作到分裂，再从分裂到合作几次反复，才完成了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革命的胜利。从 1949 年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又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反复的实践中，又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解放生产力和富民的道路。当然，付的学费不少、教训很深，但总的方向是对的，虽然前进的路上仍有相当多的有待探索的问题。但只要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科学原理，一定能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这个东方泱泱大国，有责任对世界作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经验。

—

中国有 5000 年的文明史，又有四大发明，也创造过汉、唐的文化繁盛的文明、元

代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又由于封建专制的束缚，到了近代，生产力发展不快，封建体制内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极不充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极不充分。从 16 世纪起，当西方列强的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生产力的发展，到了 18 世纪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进一步的解放了生产力。老牌帝国主义的英国，最先发生大宪章运动的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资产阶级革命使英国国力大增，他们船坚炮利，到东方侵略，创造了太阳不落的大不列颠的帝国。英国在侵占印度后，又把矛头指向中国，他们把鸦片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引起了清王朝朝野震惊，遂有林则徐的广州禁烟运动，由此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打了败仗，而后，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国是屡战屡败，一次又一次割地赔款，充分暴露清王朝封建帝制的腐朽，也激起了中国有识之士的爱国义愤。

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尚处萌芽状态，中国的资产阶级人数很少，未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条件不成熟。而有识之士是一些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讨论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如何富国强兵的设想。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借鉴日本的经验，走“君主立宪”维新的道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他们寄希望于光绪皇帝，并寄希望于袁世凯的军事支持。由于当时封建势力过于强大，袁世凯的告密叛变，一场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另一支革清朝命的力量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兴中会，以后又改为同盟会。他们主张搞武装起义，但人数不多，仅依靠国外的爱国华侨的支持，搞有限的武装起义和暗杀行动，也是屡屡失败。

清朝是满洲贵族为主组成的封建王朝，所以有一个民族矛盾，清初的所谓的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都是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汉人的会道门组织。到了清末，相当多的汉人入朝为官，这个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另外，经过几百年，八旗子弟已经腐败，军事上是靠以汉人组成的绿营，到 19 世纪末，清朝接受洋务派的建议，购买洋枪洋炮，训练新军，这支新军以汉族为主体。一大批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大都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他们回国后，大都参加了新军，这批人成了革命的中坚力量。当时的同盟会，他们的革命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场革命是有民族和民主的性质。

这场革命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资产阶级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又加上又有民族矛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一场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后发生的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是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造成的。

二

1911 年 10 月的武昌起义，事发突然，确实有极大的偶然性。起义的原因是清朝的

权贵觉察到新军中有大量的革命志士，怀疑图谋不轨，所以收权加以镇压，这叫官逼兵反，他们确实仓促起事。他们一起事，武昌的满人瑞澂逃跑，而武将张彪又不敢用兵镇压。清政府拟请袁世凯再次出山，袁不出，而出兵后又不打武昌革命军，以此要挟清政府。

而武昌的革命军，自知仓促革命，难以掌控局面，故请求旧官吏黎元洪出面维持，据说革命军找黎元洪，黎害怕钻在床底下，是从床底下找出来让他出面主持大局，得以支撑危局，以求革命深入，这种求退以进，是无可指责的。当时孙中山自 1911 年 3 月份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亡命海外，辛亥革命成功了，但群龙无首。辛亥革命后，各地军阀拥兵自重，清帝退位了，中国一度出现“权力真空”，使中国发生了多年的军阀混战，把中国人民推向了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造成了历史悲剧。

现在回想这段历史，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个早产儿，先天不足，所以，在历史进程中，两个阶级之间的搏奕反反复复。“推翻王朝易、终结帝制难”。1912 年，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但国库没有钱，财政部告诉只有八元钱，由于没有钱，也没有军队，各地军阀根本不听孙中山的，都各自为政。孙中山没有办法，让袁世凯当总统，实现共和，搞议会政治。袁世凯根本不搞议会民主政治，而是把议会作为自己的为所欲为的工具。他想让宋教仁组阁，但宋教仁提出搞政党内阁，搞西方议会政治，而袁是要搞袁氏内阁，双方意见不合，袁世凯于是派刺客在上海火车站枪杀宋教仁，于是国内舆论大哗。后来袁在日本人唆使下，遗老遗少的怂恿下，自己称帝。孙中山痛心疾首地说：“失去一满洲之专制、转造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南社诗人蔡济民诗曰：“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辛亥革命给我们的教训是，光有革命的愿望和理想是远远不够的，首先要有革命的武装力量，还要有经济、有支持武装的军费。要有革命的军队，才能统一全国，缔造共和。

孙中山先生奔走呼号，也曾与外国谈判，希望给予贷款，给新生的革命政权以支持。但国外列强都不给经济援助。而大资产阶级也不敢支持孙中山，因各地的军阀都独霸一方。后来袁世凯称帝，遭到各地军阀的反对，先是云南蔡锷，将军拔剑起南天。往后的北洋政府，都是军阀执政，谁都统一不了谁，像政治走马灯，你上我下，各系军阀轮流坐庄。

新疆，在 1911 年底，爆发了伊犁辛亥革命，并把当时的伊犁将军志锐送上断头台，其激进程度，超过了武昌起义。

新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是从湖北调来的一支混成旅新军，旅长杨缵绪是同盟会会员，留日学生，同来的冯特民、冯大澍、李辅黄、郝可权、李梦彪、邓宝珊等，都是革

命分子。他们到伊犁后，极力鼓吹革命，并办了汉、满、蒙、维四种文字的“白话报”，并联络各地军人，当地的会党，历诉清政府的腐败，丧权辱国、激起了伊犁当地各族军民的同情，受到民族上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革命。当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当时的伊犁将军志锐慌了手脚，立即遣散新军，又不发路费让其回家，任其挨冻挨饿，饥寒交迫，激起武装起义，当夜就攻克了将军署，把志锐枪杀街头，第二天，邀原伊犁将军广福出面调停，并推广福为临时政府都督。

伊犁辛亥革命胜利后，而迪化的巡抚袁大化曾出兵讨伐，双方在精河固尔图交战，由于革命军中钱广汉和李辅黄临阵意见不合，被迪化的王佩兰部钻了空子，革命军被包围，汲汲可危。杨缵绪立即从伊犁派援兵，鼓舞士气，把王佩兰部歼灭。革命政权得已保住。

由于新疆巡抚袁大化无心在新疆恋栈。乃向伊犁革命军政府求和，自己东下离开新疆。双方代表在塔城会合，并商议宣布新疆共和。原来伊犁革命志士有的东归，有的被杀，最后是杨增新当上了都督，统治了新疆17年。

新疆宣布共和后，而北洋政府经常易帜换帅，所以，杨增新在新疆是闭关自守，对北洋政府是认庙不认神，派了一个新疆民意代表张凤九常驻北平，当新疆的民意代表，互通信息。

当年，各地军阀分雄割据，内地连年战争，民不聊生，而在新疆虽然闭关自守，但杨增新信奉老庄哲学，搞无为而治，使新疆不受兵灾之祸。

无为而治是在于与民休息，讲求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保持一个安定无忧的秩序，让人民在平稳体制所提供的广大空间中自由地谋求福利，恢复生产和繁荣经济，杨增新这一政策，是得到新疆各族人民认可的，我在征集文史资料口头文化时，各民族对杨增新有好感，说老将军平易近人，敢于惩治贪官，因而民族关系不恶化，有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

从辛亥革命起事之日起，一直到20年代，中国虽然为军阀混战所纷扰，社会动荡不安，很多人感到迷惘。但就是这一、二十年间，中国的文化思想十分活跃，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启蒙运动。乱世出思想家，各种思想的表达。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思想启蒙者，有了启蒙，才有革命运动。知识分子必须具有探索性、批判性和有危机意识。而大一统的年代，知识分子反而集体噤声，或被招安不敢讲民间疾苦。

在当时，革命运动的启蒙者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他们在创办的《新青年》

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发人猛醒的文章。当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办学方针上，力主“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的原则，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以俄为师，也可以讲玄学。北京大学一直把“民主、科学”作为校训，激励学生为中国的民主和富强而奋斗。“民主、科学”在当时以“德先生、赛先生”在讨论、探索，以此来救国救民，这是文化启蒙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鸣锣开道。

在“五四”前后，由于军阀分雄割据，整个社会大环境对文化还是宽松的，中国人民的苦难，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为此激醒。除了理论上探索外，又有象矛盾、巴金、郁达夫、鲁迅、李劫人等等的作家，他们用文艺小说的形式，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不平。从这一点来讲，中华民族不愧是伟大的民族，有众多的精英，谱写了不朽的惊世之作。象俄罗斯，它的农奴制，社会的不平，出现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还有杜格涅夫、A·托尔托泰、高尔基等……。一个新制度诞生前，就会有一个文化启蒙运动。在资产阶级革命不充分的条件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的特殊性，也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所能产生的。东方的亚细亚社会，封建专制政权，产生了《红楼梦》，印度产生了泰戈尔。

1921年共产党的成立，孙中山先生首先承认了共产党，提出“联苏、容共、扶助工农”政策，并促成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的一个榜样。孙中山先生为求外援，一直求日本、英、美都碰了壁。而求苏俄，答应了，1922年8月，苏俄派越飞为代表到中国，拟给孙中山400万至500万金卢布的贷款，援助国民党，孙中山也拟把新疆作抵押。1923年，孙中山派蒋介石去苏俄考察，蒋在苏俄主要考察军事和军事院校。蒋介石回国后就筹办黄埔军官学校。1924年1月24日，黄埔军官学校成立，蒋任校长，苏俄派鲍罗廷为该校军事、政治顾问，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为共产党培养了33名将领，象林彪、陈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历史表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唯一的就走武装革命道路。

四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经济仍然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薄弱，仍然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这是当时的社会形态。当共产党建立，宣传共产主义和搞工人运动时，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感到恐慌，他们要找一个代表人物与之抗衡。国共合作必然会破裂。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1927年北伐战争打到上海，上海闻人虞洽卿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与蒋介石接洽，

要蒋介石反共。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拜会蒋介石，提出“只要你和共产党决裂，我们就给予财政援助”。据说，4月1日就给了300万，“四·一二政变”后，又给了700万。蒋介石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代表，在统一战争中突然叛变，是历史现实决定的，不是偶然的。

“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党也领悟到搞发动工人、在城市搞工人运动是无法进行下去，也只有以武装对武装来进行革命。1927年，周恩来、贺龙在南昌领导起义，组建共产党的武装队伍，中国的革命是武装革命，议会斗争之路是走不通的。但当时共产党的中央仍在城市，只是处于地下。当时我们共产党员中有相当多的坚持信仰和非常杰出的人物，例如有名的龙潭三杰，就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他们打入了敌人的心脏。当武汉的中共高层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第一接到信息的是打入中统局内部的钱壮飞，是他在千钧一发的危局时机，从南京到上海，通报给党中央，使上海的党中央没有受到很大损失，从容撤出上海，到瑞金红色根据地。而城市的斗争，搞工人运动，飞行集会，屡遭失败，共产党从国共分裂后，悟到了发动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而在大城市，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1927年后，新疆的历史经历了一次动荡。民国十七年，杨增新被樊耀南枪杀，金树仁上台，金树仁重用河州人，他的官吏腐败和专横，激起震撼全疆的哈密农民暴动，然后是马仲英进疆。1933年，在新疆的迪化，暴发了“四·一二政变”，由此盛世才夺取了新疆的统治权。公开宣扬马列主义。从1927至1936年，共产党最为艰苦的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新疆却是能够宣扬马列、民主和阳光的一块乐土。革命志士杜重远写了一本《盛世才与新新疆》的小册子在内地发行，吸引了大批进步人士到新疆，像茅盾、赵丹、王唯一等。同时又有一批中央党员到新疆工作。红四方面军一支400人的队伍在星星峡得救，在新疆建立新兵营。我们中共领导人去苏联，都假道新疆。这是新疆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五

1927年至1935年，是中国共产党最为艰难的时候，蒋介石是坚决反共剿共，逼迫中国红军实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艰难时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步步紧逼，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关头。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发动“西安事变”，逼蒋介石抗日和放弃反共的政策，国共第二次合作，使中国的革命得以继续。也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转辗敌后。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革命武装

队伍，扩大了红色根据地，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上台后，他奉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模式，实际上是专制独裁的政体，这就是东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体，它植根于东方的生产力不发展，是农业自给自足贫穷的社会的反映。东西方对民主和人权的分歧在这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熏陶，不经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加上贫穷，文化素质不高，自然而然地是强人政治。在我们党内，过去是继承列宁学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主持的”。我们共产党也受到这种东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影响。

在国共两党搏奕中，共产党比国民党高明，一是打一场农民战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战争，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军队以贫下农为主体，他们为自己的理想而战，而蒋介石的军队是雇佣军，一部分是抽壮丁强迫当兵的，没有士气，号称 700 万，不堪一击。二是共产党搞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特别向往自由的知识分子。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失去他们的支持。在知识分子中，相当多的中共人士，又打入蒋介石军政内部，除了前面的龙潭三杰，还有后龙潭三杰，即熊向晖、陈忠经、申健。这些都能及时把内部情报送出。例如：熊向晖一直是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厅副厅长吕出，他就是潜伏在胡宗南部，从事电台工作，原民委干部王冠州，他是胡宗南前线电台报务员，胡宗南的作战计划到前线，当天就由他发给延安另一个小电台。蒋介石失败后到台湾，才领悟其失败的原因，但为时已晚。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新疆一直是大后方，又是盟国军援的交通线。为了支援抗日，新疆人民曾捐献飞机，又成立中运会，沿途有接待站，专门接待军援车队的住宿，军援物资都送到兰州，回程装羊毛、矿砂，所以把苏制的汽车新疆都称呼为羊毛车。在抗战最艰苦阶段，中缅公路运输中断，盟国军援物资在印度，新疆叶城的维族人民用马队，历时几个月，翻越雪山，把军援物资驮回叶城然后用汽车运到兰州。新疆人民支援抗日也应得到功高盖世和名垂青史的美誉。

当然，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还有另一个方面，他就是杀人无数，滥杀无辜。新疆人民对他确有深仇大恨。但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思和对斯大林清洗内幕的的揭示，盛世才的杀人和斯大林的清洗很多相似之处。

第一，盛世才滥杀无辜是在 1937 年，是与斯大林大清洗同一时间，先是盛抓捕了自己的亲妹夫俞秀松，他妹妹盛世同要盛世才救，盛不敢救。引渡到苏联给秘密杀害了。

第二，盛世才抓人杀人的公安管理处，是苏联人卡德尔·阿吉掌控的。公安管理处

都听他的，公安处副处长赵剑锋对制造阴谋暴动案抓人有意见，盛世才就把他调动塔城去当专员，后来赵剑锋又秉报苏联在塔城边界向我方移动 20 公里边界，侵占我国领土，盛世才以赵剑锋对友邦不友好通报批评。

第三，据有关方面透露，斯大林让盛世才把新疆的民族上层人士，原来的旧官吏，所有的有钱人，新疆的巴依全部消灭，所以，这方面都以阴谋暴动案为罪名，全部抓捕、家产抄没、大银行的金库存放大量抄没的金银珠宝，盛世才离开新疆时，装了 20 大车。而被抓人士的亲属，叫叛逆家族，全部迁到伊犁地区看管。新疆是人间地狱不为过。当时有首民谣形容恐怖气氛：“春眠不觉晓，处处闻狗咬，夜来汽车声，不知抓多少”。

第四，所谓阴谋暴动案，它的制造过程就是抓几个人屈打成招，按应网罗的人物进行诱供，然后按既定的名单抓捕，再严刑拷打，屈打成招。像原哈密农民暴动领导人和加尼牙孜阿吉、哈族青年领袖沙里福汗窝阔台、原军法处处长冯樑等，都被抓捕杀害。富商胡赛音巴依也杀了，而蒙古的王子满楚克扎布在监狱疯了，没有被杀。历史老人东北人谷梦林用了半年时间从档案馆抄录了大量原始被害名单。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新疆大部分将领及其下属都被杀了。

第五，后来，盛世才把延安派来的中共党员，也制造阴谋暴动案全部抓捕，而斯大林没有挽救，最后是张治中先生救出并派军车送到延安的。盛世才还把自己的胞弟盛世祺杀死，嫁祸弟媳陈秀英，又是一大批人死于非命。

第六，斯大林生性好怀疑，从不相信人，他搞特务统治，只要有人告密，他就下令秘密杀害。在 1965 年，原公安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石元璞，原判死缓，但 65 年被释放，我与他交谈过好几次。他自认是双料特务，他是汉人第一期留苏生，回国前他参加苏方情报员，专门监视盛世才，而盛世才在他回国后以留苏生的身份窃取苏方的情报。是双料特务。实际上斯大林和盛世才是相互利用，又互不信任。最后盛世才又投靠国民党。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在晚年才说出，盛世才被逼和后怕才背叛了斯大林。斯大林不甘心失去新疆，于 1944 年支持三区革命。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邀请三区领导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斯大林很可能怕他们说出许多秘密内幕，制造一起空难以灭口，这种事对斯大林是小菜一碟。我这是一种推理。不过历史上左倾路线、大清洗给人留下好多惊心动魄的史实。回想起来，也是一种历史的无奈。

在盛世才统治的年代，所有达官贵人，都派有特务日夜看守叮哨，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客，不来往，都循规蹈矩，但都逃不了遭难。但又有一个特例，就是已故文史馆员王子钝老先生，他是老实人，在 1940 年，有人对老先生说，你快辞职请假吧！不然，该挨到抓你了。结果王老先生被派往和静当县长，免遭一劫。斯大林的这种清洗手段的特务统治，把人逼到装弱智，你聪明能干必然遭难。这是历史一瞬间，又似乎难以避免，

历史从苦难走向光明，也是一种规律。历史功过，都是后人评述的，当代人很难客观公平地加以评述。

六

1944年11月发生的伊犁三区革命，使新疆再度失控。1945年召开的雅尔达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了新疆问题，在英、美的调停下，斯大林同意交还新疆，故有张治中的新疆之行。

三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盛世才杀人将近10万所积的仇，但受到伤害的是普通百姓。盛世才是汉人，我们的民族兄弟把仇恨发泄到无故的百姓头上，因为盛世才跑了，到重庆的中央当农林部长去了。但汉族人也恨盛世才，1949年3月，在兰州发生了一宗灭门惨案，那就是盛世才的岳父，在兰州当寓公的邱宗浚，一家13口被杀，是灭门案，是汉族人干的，在冥冥之中应验了因果报应佛法的哲理，坏人是要下地狱的。

张治中作为中央大员，到新疆是临危授命。与历代出使新疆的封疆大吏比，张治中是最为杰出的。他既爱国，又爱新疆，他根据实际情况处理新疆历史最为棘手的民族问题，他既要听蒋介石的，有时也不完全请示，像送中共人士回延安，途中胡宗南要扣，他让送的少将处长刘亚哲冲关直驶西安。他主张中苏友好，报上要登苏联幸福生活的介绍，曾遭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他的治新方针政策，有理有节，既坚持原则，又好言相劝，优礼有加。张治中带来的班底都比较开明，像刘孟纯、屈武，他的办公室主任是陶天白，秘书余湛邦、张立钧等人，解放后都安排为要职。为了和平解放新疆，他在蒋介石面前又力荐包尔汉当新疆省主席，力推儒将陶峙岳为新疆警备司令。新疆和平起义，是张治中先生按党中央的意图，精心策划的。

张治中对主张新疆独立两派都一视同仁，对北疆的三区人员和南疆艾沙、买买提明，他都能与之沟通，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亲自到伊犁访问，又到喀什、和田视察，屡遭围攻，但他无怨无悔。治理新疆，要有忧患意识，要抛却个人升官梦，一切以国家的统一为重，为新疆的各民族安居乐业为重。他爱国，爱新疆，爱新疆各族人民。

在历史的长河中，所发生的人和事，是历史。对这些人 and 事，我们必须用理性去分析，去反思，去总结。从而丰富我们的智慧，理顺一些关系，使生产力进一步解放，从而推动历史的进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大国，它的文明，对世界是有贡献的。而从上世纪的辛亥革命，到今天是100年，在这100年中它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从一个饱受被西方列强欺辱的弱国，一跃成为经济强国，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东方的亚细亚社会有借鉴作用。

七

从 1911 年至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回顾这一段历史，其内容十分丰富，而道路是既反复，又曲折。最初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走君主立宪的道路。由于清王朝是极端集权的专制政体，权力不容分享。所以，维新变法的道路走不通，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鉴于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西方的议会民主也走不通。搞“暴力革命”，当辛亥的武昌革命打响了第一枪，接下来是军阀割据，落了个“权力真空”，而革命党内部又发生了分化，有些人成了新官僚，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最后，孙中山从俄国“十月革命”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走上“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并以俄为师的新革命道路。孙中山办黄埔军校，搞武装革命，北伐战争，统一了中国。又由于国民党及其军队成员的阶级基础，他们跟封建地主阶级及西方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数由官僚买办、地主阶级转化而来。蒋介石的国民党是代表官僚买办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不给农民土地，对工农的民主运动实行镇压和专政。1927 年的“四·一二政变”就是明证。大资产阶级出线，蒋介石叛变革命，镇压共产党，屠杀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此时也清楚看到，只有进行武装革命斗争，在 1927 年 8 月 1 日搞南昌起义，搞武装革命斗争，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镇压。

19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引进马列主义，当时是为了“恢复中华，救亡留存”。一开始实行国共合作，共同北伐，统一中华。当时似乎搞国共合作，搞联合政府。但蒋介石奉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不允许共产党存在。中国共产党只有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发动农民，打一场农民战争。

蒋介石由于有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在这场国共两党的战争中，国民党占了上风，逼迫共产党退出苏区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曾至有计划打通国际路线上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争取苏俄的支持。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势汹汹，中国又陷入救亡留存的局面，于是由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在这场民族救亡运动中，共产党壮大了，根据地扩大了，革命武装大发展。国际的大环境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苏联出兵远东，消灭了日本关东军，结束了抗日战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故态复萌，仍然要消灭共产党。他不顾美国和苏联的劝告，毅然发动第二次国内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是过高估计自己，结果以失败告终，败

逃台湾。蒋介石在台湾接受了教训，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是取得了成功的。

在整个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又把马列主义民族化，改换苏维埃的旗帜，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所必须，从而争取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并同国民党联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继而共产党又高举和平民主、反封建的旗帜，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各民主党派，搞统一战线，团结了全国人民，并给农民以土地，进一步争取了农民，从而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危机，而共产主义是很时髦的，知识分子非常向往。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都向往去延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希望中国强大，要摆脱列强对中国的欺凌，而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满，他们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

另外，有一部分在白区工作的知识分子，打入了国民党内部，也有的以不同的身份，为共产党工作。我在搞文史资料工作中，遇到过这些人。如新疆民委干部王冠州，原来就在西北军胡宗南部的前线电台当报务员，每次胡宗南的作战计划，他都及时给延安的小电台抄送。胡宗南打败仗的原因就是我党及时知道作战计划，事先都有部署。

八

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受到苏共斯大林左倾的影响，所谓“使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左的党内清洗的斗争。在建国后，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影响下，苏联的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公有制，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在理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接触到的是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其发展必然使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而敲响了资本主义丧钟。当时，社会矛盾十分严重的沙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而列宁又预言资本主义已发展到腐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产生了“一国革命胜利论”。但现在回想，正如恩格斯在 19 世纪末所说：“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情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具有很大扩张能力，而工人阶级自身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实现社会改造，并进行统治的程度’”。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论上都没有认识到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后，要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所有制改变后，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展生产，产生经济效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缩小两极分化，白领增加，蓝领减少，壮大中产阶级，这是一条符合社会发展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所制定的国旗、国徽，象征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

农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这是符合国情的。但在进行土地改革后，农民刚得到土地，很快用行政的办法搞合作化，接下来是消灭资产阶级。如果追溯历史，在 1947 年 10 月 27 日，党内有个指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另外，对曾在白区工作的人员，也有党内指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在 1958 年 4 月 6 日，在武汉会议上提出“除地、富、反、坏、右外，再加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划入资产阶级”。这是历史的伏笔，在革命胜利后是继续搞阶级斗争，这就是我们在建国后的前 30 年，政治运动不断，党内斗争也不断，不间断的政治内耗，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还有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者，最后是党内走资派，搞自我消耗。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顶峰。

在世界历史上，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都付出了血的代价，好像是无法避免，我们也是交了学费的。所以，尽量减少损失和伤害，搞适应社会转型，更快更好发展生产力，逐步缩小三大差别，这是摆在革命的执政党面前的永恒的主题。

建国后 30 年，主要教训是我们党思想上没有从革命党向执政党方面转移，而是继续的革命，不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矛头指向了同盟军，专了人民的政。我们的革命领导人中，还有“农民打天下，农民坐天下”的情怀，有农民的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搞人民公社化，搞吃饭不要钱的大办食堂，结果饿死了相当多的人。另外，没有根据东方亚细亚的生产力水平，搞穷过渡，过份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用发动群众，用政治斗争手段来推进社会主义。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打翻在地，把刘少奇戴上了叛徒、工贼、内奸三顶帽子整死。我参加了建国后所有的政治运动，参加抓走资派的农村四清运动。到 70 年代，农民都消极怠工，都欠公社的口粮钱，没有生产积极性，靠我们干部、解放军下农村去搞春耕、秋收。那几年，干部、解放军年年下乡去督促农民搞生产。

九

文化大革命搞的得无法无天，天怒人怨，粉碎“四人帮”是一种报应。但由于我们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领袖的言论是不可改变的。中国要前进，必须要否定长期形成阶级斗争的理论，把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要有新的敢于突破的新权威主义的人物，邓小平成为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过去 30 年，我们搞传统的社会主义，没有效益，是失败的。计划经济道路行不通，按劳分配的原则也未实行，养了懒汉。所以，要进行更新，使社会主义有新的定义是公